

王东京 主编

2007年卷

第3辑

F12-55/2

中国经济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要闻评点

中国不应仓促实施反垄断法

政府角色：解铃还是系铃？

再论文明社会的两大尺度

质疑快乐经济学

中国经济何以顺应世界大势

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重在政府转型

对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几点认识

关于中国“中心任务”的思考

金融安全和金融开放

财政体制改革反思

从流动性过剩到股市泡沫

正在出现流动性短期拐点

防止掉入中等国家陷阱

流动性过剩与房地产发展

城乡兼顾很重要

民营资本促进县域城镇化的积极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年卷 第 3 辑

中国经济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王东京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所载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本社观点

责任编辑 朱晋平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 2007 年卷. 第 3 辑/王东京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035-3774-5

I. 中… II. 王… III. 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6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62 千字

定价: 25.00 元

《中国经济观察》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珏 江小娟 刘 伟 刘海藩
李兴山 张卓元 张尧学 苏 星
宋 涛 林毅夫 顾海良 梁小民

主编: 王东京

副主编: 赵振华 (常务) 韩保江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安培 王天义 王东京 王国平
王 健 宁向东 张 军 张维迎
陈甬军 陈晓红 杨秋宝 杨瑞龙
郑介甫 柳 欣 赵振华 洪银兴
顾海兵 黄少安 梁 朋 韩保江
谢鲁江 潘云良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永臻 王君超 石 霞 田应奎
刘振英 刘艳梅 李 蕾 李继文
李省龙 李旭章 李 鹏 张玉杰
张燕喜 陈文通 陈宇学 赵锦辉
施 虹 胡希宁 徐平华 徐祥临
贾华强 曹 立 曹 新 董艳玲
鲍永升

编辑部主任: 孙小兰

主办: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目 录 Contents

第3辑

.....

热点聚焦

Hot Spots in Focus

- 3 2007 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要闻评点 王佳宁
Review of Important Economic News in China in the Three
Passing Seasons of 2007
Wang Jianing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 19 中国不应仓促实施反垄断法 薛兆丰
China Shouldn't Enforce the Anti-monopoly Law in Haste
Xue Zhaofeng
- 33 政府角色：解铃还是系铃？ 金 碚
The Role of Government: Untie the Bell or Tie the Bell?
Jin Bei

- 39 再论文明社会的两大尺度 王忠明
More Views on Measurements of Civilized Society

Wang Zhongming

- 51 质疑快乐经济学 顾海兵
Raising Doubts to Happy Economics

Gu Haibing

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61 中国经济何以顺应世界大势 姜波
How can Chinese Economy Go with the World Trend

Jiang Bo

- 76 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重在政府转型 王振中
The Key of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Wang Zhenzhong

- 81 对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点认识 牛仁亮
Some Opinions of Cur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s

Niu Renliang

- 89 关于中国“中心任务”的思考 王志平
Reflection on “Central Task” for China

Wang Zhiping

财经观察

Finance Observation

- 103 金融安全和金融开放 祁斌
Financial Security and Openness

Qi Bin

- 109 财政体制改革反思 贾 康
Reflections on the Reform of Fiscal System
Jia Kang
- 118 从流动性过剩到股市泡沫 钟 伟
From Liquidity Surplus to Stock Market Bubble
Zhong Wei
- 132 正在出现流动性短期拐点 巴曙松等
Liquidity Short-term Inflection Points are Coming
Ba Shusong et al

短论三篇

Three Essays

- 139 防止掉入中等国家陷阱 汤 敏
The Avoidance of Falling into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Trap
Tang Min
- 143 流动性过剩与房地产发展 赵 晓
Liquidity Surpl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Zhao Xiao
- 148 城乡兼顾很重要 周其仁
The Importance of Balancing Urban Areas and Rural Areas
Zhou Qi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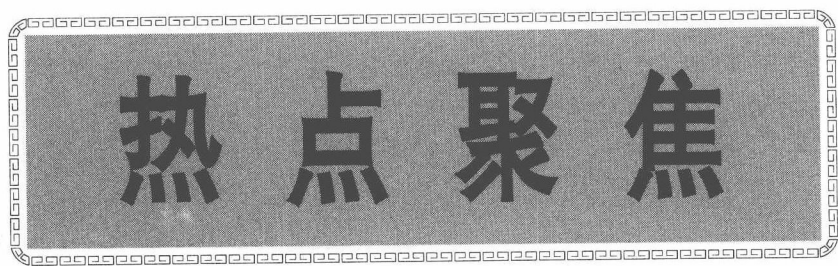
调研报告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 155 民营资本促进县域城镇化的积极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调研组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Role of Civilian-run Capital in
Accelerating the Urbanization of Counties

中国经济观察

2007 年卷 第 3 辑



Hot Spots in Focus

2007 年前三季度 中国经济要闻 评点

王佳宁

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漫长而值得期冀，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2007——“十一五”规划的第二个年头，全球化进程的国际视野中，泱泱大国全面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在为公众谋福祉的蓝图上，一滴水可见太阳的光辉；在关注民生的理念中，一件事足以引发深刻的遐思。

一、全球化催生深谋远虑的政府

2007年6月8日，中国应邀出席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G8峰会。之前，G8峰会是一个发达国家间的对话平台，许多时候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性。这次中国与G8国家的对话过程，使其议题被打上多元的全球化烙印。代表发展中国家与G8成员国对话，凸显中国作为一个有国际责任感的泱泱大国，已经具有良好

作者系《改革》杂志社执行总编辑、编审。

的国际政治习惯。

是年6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2006年6月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第二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的“个性化”试验区。在近20个或以城市名义申报，或以城市群联袂出手，纷纷角逐试验区的过程中，重庆市和副省级成都市先声夺人。

一如上述出席G8峰会的深远意涵，在全球化条件下，在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进程，以及区域经济新格局中，以“周密地计划，往长远里考虑”为核心含义，催生政府深谋远虑。

深谋远虑是一种大思维。当下，区域经济与全球化共同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以区域联合和城市群为特点的新经济发展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国际间资本要素流动增长将继续快于商品贸易流动的增长。在这个大局观下，呼唤政府官员坚实的理论支撑，因为具有理论功底方可构建大思维。就像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观点：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时候，这个国家本身会比以前有所改善，其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提高。这种大思维还表现为，国际分工生产的国际专业化，是一国内部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面发展的产物。

深谋远虑是一种大视野。在当代世界分工的视野中，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主、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逐步发展到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市场自发力所决定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和跨国公司所组织的分工方向发展。必须进入政府视野的是，只要一国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相对地低于另一国家，那么国际贸易就有存在的基础。从目前各国对国际资本流动持积极欢迎的态度来看，资本要素流动增长速度还会加快，而国际间货物贸易由于受到各国技术壁垒的限制，各国普遍对商品流动的接受程度较低，全球商品贸易量的增长率将大大低于国际资本的增长率。

深谋远虑是一种大局观。正如斯密的自由贸易论一样，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也表明，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是最有效地利用一国资源的

途径。于区域经济亦然，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必须打破壁垒。前不久，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区域合作组织共同签署了“关于区域合作组织间开展工作交流与合作的协议”。在西部，川渝高层及执行部门频繁互访谋发展，其同步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个性化”试验区，是为有力注脚。

深谋远虑是一种大行动。经济学大师肯尼思·阿罗在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指出：“人们根据偏好决定效用，又根据效用决定个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引申，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行动的重要选项是如何“转型”。在转型中，政府往往成为全社会的唯一责任人、社会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尤其是，在忠于职守的上级政府、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和积极的公民社会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互动机制，需要人的全面发展。而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的若干行动将持续考量各层级政府能否深谋远虑。

二、限建办公楼意味新一轮调控发端

中央《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已成为现阶段掌控各层级政府“擅自做主”行为的“尚方宝剑”，加之今年以来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具体监察土地的国土资源部接二连三释出“从严从紧控制用地规模”信号，限建办公楼意味着新一轮宏观调控正式发端。

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在宽松、有秩序的环境中把握民生问题，从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今年以来的迹象表露，一些地方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方法表现为大量拆迁，引发被动性需求；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推动房价不断上涨。同时，一些党政机关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呈愈演愈烈之势：有的违反审批程序，越权审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筑面积；有的不注重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经济实用性，盲目攀比，贪大求洋，搞豪华装修；有的不惜贷款、举债，甚至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等专项资金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此类行为令公众黯然。

之前进行的六次宏观调控“预警”：经济过热缘于房地产行业，没有房地产行业投资的连续高速增长，就不会有钢铁消费与生产的高速增长，也就不会有电力的紧张和煤炭的短缺。从宏观调控形势前瞻，以及公众的期待判别，政府能否率先垂范是宏观调控取得何种效果的肯綮。

所以说，限建办公楼这一政府决策不是孤立地存在与发展的，相反，这个领域的政策问题，往往与其他领域的政策问题相关联和相互影响。在本次限建办公楼之前，高层曾就暂停审批、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连发两个紧急通知，其“关键词”均为叫停盲目用地，控制“圈地热”。当下，“过热”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市场范畴的问题，另一种却属于行政范畴，限建办公楼、叫停盲目用地正是针对后一种“过热”。而对于前一种“过热”必须通过市场的办法去解决，但对于一些城市违规设立各类园区、非法圈占土地、盲目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理所当然必须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予以遏制。只要“行政”不“过热”，市场的“过热”解决起来并非那么难，如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土地审批权限，建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制度等。

由上引申，限建办公楼是一项重要的行政决策，其基本动机使公众看到了一个初步规范。这个规范就是，政府决策的首要前提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调控人的角色，主要针对宏观层面而言。而政府限建办公楼、叫停盲目用地这类决策，直接影响政府作为调控人角色是否“胜任”。即衡量这一决策的效应，首先必须确定政策效能的标准，而这取决于一项政策对社会的贡献与社会为它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差别。所谓好政策，是指这样一种由政府文件演化的行为，它带来了社会中特殊群体的额外满足（如经济适用房用地的批准，是因经济适用房为中低收入者而建），大于那些为了支持这种政府行为所付出的方方面面。既然限建办公楼、叫停盲目用地这一决策代表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其效应则取决于各层级政府的落实和执行情况。

限建办公楼只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央行的货币政策则是另一种“晴雨表”。中央《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

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最终能否实现“实质”大于“形式”，重点则在于行政资源的操盘。

三、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

继 2006 年 6 月天津滨海新区晚于上海浦东新区一年，成为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第二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2007 年上半年，围绕谁会成为第三个试验区，或以城市名义申报，或以城市群联袂出手；有的在已经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交议案，有的则透过各类媒体大造“比较优势”。

试验区的吸引力在于以“试验”的名义，中央向地方让渡部分职权。透过新华社公开披露的深圳、重庆、成都、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武汉、杭州、广西北部湾、苏州工业园区、哈大齐工业走廊区等近 20 个以各种名义申报试验区的情形，以及中央相关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响应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速度，市场原动力的形成左右政策调整的成效。在这根链条上，试验区的催生改革模式功能，抑或示范、引导，一如“鲶鱼效应”，即试验区对周边城市、省份的隐性激励。从区域发展格局考量，重庆成为试验区当在预料之中。重庆升格为中央直辖市十年来，在多个改革领域积累了一定的“试水”经验。今年 3 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把重庆加快建设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重庆成为第三个试验区的重大背景。

2007 年 6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成都的“试水”将以点带面。特别是重庆将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着眼点将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主线完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改革上的创见，助推成渝经济区建设和大西南六省区市的融合，进而产生对西北的影响，西南西北“活”，则西部“活”，西部“活”，则区域“一盘棋”游走自

如，是谓之典型的“骨牌效应”。

经济发展不是在每个地区都以一种同样的速度进行的，而是在不同时期，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主导行业，而这些行业和部门一般集中在某些城市和地区，这些增长极与增长区域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增长极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区域市场和多种资源的支持，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某一增长极的引发与带动，印证并迎合了以全球化、区域化为宏观背景的世界经济大趋势。在“十五”末期的我国 GDP 总量中，东部地区占 55.4%，东北地区占 8.7%，中部地区占 18.8%，西部地区占 17.1%。因此，武汉、苏州和东北的一些城市竞逐试验区，不难解释其动机。

诺思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必须强制执行经济游戏的规则，这里，国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面对关联交易的经济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先后经历了五次调整，即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开发开放浦东、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率先突破和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些调整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转向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方法，而是通过改进物质刺激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他们配置到在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制的部门。

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模型领域的先驱丁伯根认为，如何使用经济学分析帮助政府开发提高经济产出的计划。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国民关于经济目标的集体偏好。可结合各地实际，批准一地一区的个性化试验，即，先“小试”后“大试”，如，重庆试城乡统筹，广西试与泛北部湾的东盟国家优势产业、边贸对接，湖南试打破长株潭机制障碍，武汉试连接南北“枢纽”，等等。谁的“鲶鱼效应”先声夺人，哪里自主改革的“骨牌效应”被广泛认同，便是第三甚至第四个试验区。

究竟如何看待各地竞逐试验区，上述独立视角不是唯一答案。如果只是以简单的逻辑思维对竞逐试验区的表象作出判断，也许我们的盲点和误区还会更多。

四、蓝藻污染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吗？

2007年5月发生的严重环境危机——太湖蓝藻污染问题被暂时遏制后，江苏无锡市一位主要领导在中外媒体记者会上通报这个事件时举例说，英国作为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首都伦敦曾是“雾都”，而泰晤士河也曾是条“臭水河”，他因此认为生态遭破坏的问题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

在“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的语境下，太湖蓝藻污染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工业化初期的必然，不排除无锡市的官员有此动机。如是，其观点的核心可以解释为，要发展工业，环境污染就是必然的，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地方政府有钱了，才能反过来治理污染。于是，“标榜”这种观点的人只做不说，默认污染企业的存在，有些甚至给予“保护”，但他们都知道这种事情是做得说不得，仍高调宣称要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等等。无锡个案实则代表了多数地方官员的心态。

诚然，像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确实有过对环境的污染。但是他们所经历的环境污染被全世界视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惨痛教训。其他后起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力图避免重蹈覆辙。如果无锡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拐点”，那么，太湖水的根本问题就不能单纯理解为传统粗放型工业“种”下的“恶果”。

近年来，大众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环保风暴，似乎只是政府刮向违法企业的政策风暴。蓝藻污染导致百万无锡市民无水可用，对发生污染的缘由，官方开始试图以气温高、降水少的“天灾”来开脱，直到民情沸腾，舆论挞伐后，最终才正视“人祸”，决定提前关闭无锡市的772家中小型化工企业。然而，当下江河日下的污染态势表明，环保风暴首先必须是一场刮向政府自身的整肃风暴。如何衍生出独立且强有力的环保督察力量，成为溯及政府权力制衡架构的一场自我检讨和自我变革。

在具体的环保政策方面，西方社会已经从“末端治理”、“生产过程控制”过渡到第三阶段，即“源头防治”，其主要措施是进行“战

略环评”，它是“从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预测和科学评价；是采取预防措施或者其他补救措施，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这种环保思想凸显：工业化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而是可以，而且应当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诚然，各层级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规、地方环境规章不胜枚举。但是，各类环境污染事故依然层出不穷。据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披露，近期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及重点湖泊进行专项检查发现，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有110个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评等级等环境违法问题，占抽查总数的87.3%；在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存在运转不正常、处理不达标或停运的现象，占抽查总数的50.6%；在529家企业中，有234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占抽查总数的44.2%。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中有多少起事故的当事人受到处罚，有多少起事故引起了政府、企业的足够重视？为什么中央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在某些地方变成了破坏性的短期行为？

2007年7月7日，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无锡召开的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整治太湖污染，铁腕治污，必须态度更坚决，行动更有力，标准更严格。笔者不怀疑江苏省政府治理太湖污染的决心。然而，政府的决心并不代表太湖水污染问题就可以圆满解决。因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并不代表最坚决环保执法。

环保危机，正以逼迫国人生存的极端形式，从似乎前瞻务虚的理念之争，变为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毕竟我们的生存需要更多的“鱼米之乡”！

五、“政府做慈善”实乃公权越位

2007年6月，山东威海全城掀起慈善捐赠的热潮。市委市政府发起“慈善月”活动，从市委书记到水电维修工，从集团公司到个体